

美国国家书评协会好书奖
纽约时报书评十四大好书

人与自然书系

最后的熊猫

THE LAST PANDA

[美] 夏勒 / 著

张定绮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熊猫/(美)夏勒著;张定绮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11.

ISBN 7-80145-054-X

I. 最… II. ①夏… ②张…

Ⅲ. 大熊猫-现状-自然保护区-四川 IV. Q959.83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521 号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UBLISHERS'S EDI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FOR DISTRIBUTION IN PR CHINA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最后的熊猫

(美) 夏 勒 著

张定绮 译

责任编辑 徐晓 特约编辑 易水

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永安路 10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印张:14 字数:285 千字

插页:0.5 印数:6,001-16,000

定价:27.00 元

熊猫没有历史，只有过去。它来自另一个时代，与我们短暂的交会。

我们深入丛林追踪它的那几年，得窥它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

本书是那段短暂光阴的实录，而非回忆。

——作者

目 录

作者序	唤醒人类的慈悲心	1
-----	----------------	---

序 曲	15
-----------	----

第1章	初访熊猫之乡	18
-----	--------------	----

第2章	卧龙的冬季	38
-----	-------------	----

第3章	熊猫政治	62
-----	------------	----

第4章	猎杀历史纪事	73
-----	--------------	----

第5章	跟踪大熊猫	85
-----	-------------	----

第6章	空心冷杉的秘密	121
-----	---------------	-----

第7章	威威的世界	149
-----	-------------	-----

第8章	臭水沟之死	183
-----	-------------	-----

第9章	熊猫王国	195
-----	------------	-----

第 10 章	珍珍吃苦记	226
第 11 章	再见唐家河	250
第 12 章	危机四伏	294
第 13 章	命运的囚徒	319
第 14 章	租我一头熊猫	343
尾声		365

跋		370
---	-------	-----

附录

附录一	追寻麒麟	381
附录二	熊猫是猫还是熊?	394
附录三	五一棚冬季鸟类	405
附录四	一九八九年“全国大熊猫及其 栖息地保护管理计划” ...	407
附录五	展示租借大熊猫立场声明书 ...	414

作者序

唤醒人类的慈悲心

我最后一次在野外看到熊猫，已经事隔多年，但它们的形象仍然冲击着我的生活。熊猫是一种禀性温和且自足的生物，它们的独特和神秘，至今令我深为感动。虽然我们的熊猫研究只触及它们遗世独立生活方式的皮毛，但如今在动物园或照片上与熊猫重逢，回忆还会源源涌现。雪封的树林，我们翻山越岭追踪一头动物而在雾里迷了路，一头名叫珍珍的熊猫在竹荫下有条不紊的嚼竹子。昔时的心境不能重现，我的经验也无从完全表达。如果剔除感情色彩，我跟熊猫相处的那几年，恐怕几句话就说完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我第一次踏入熊猫居住的森林。虽然当天我没有看到熊猫，却发现了它们的粪便，也观察了它们吃竹子的地方。四年半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是我在熊猫故乡盘桓的最后一天。这期间，头两年我都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做研究——这是中国最大的熊猫保护区，面积七百八十五平方英里。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妻子凯依，以及我们的中国同事，在区内的五一棚营地做研究。接下来的八个月，我回到美国，为我任职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纽约动物学会，撰写一篇关于熊猫的科学报告。一九八三年初，我回到中国，继续卧龙的研究，并调查四川省其他熊猫出没的区域，四川是熊猫主要产地，也是我们研究计划的根据地。这项研究使我们得知熊猫求生的不同生态条件，并帮助我们挑选第二个研究地点——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一九八四年，我主要在唐家河研究熊猫和亚洲黑熊。由于这两个动物的体积和外形接近，我希望把它们的生态与行为做一比较，并确定唐家河熊猫跟卧龙熊猫有无明显的差异。

外国专家到中国

研究熊猫四年多以后，我把计划交给我的同事——来自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的熊类专家江森（Kenneth Johnson）和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研究植物学的泰勒（Alan Taylor），都从一九八四年加入我们的计划，肯恩（江森的昵称）负责监看卧龙的熊猫，我把注意力放在唐家河，泰勒研究竹子。一九八五年，芮德（Donald

Reid) 从凯格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来到中国, 继续两个保护区的研究工作, 肯恩则参加一项熊猫口数调查, 以确定它们的物种存活状态。

我们这群所谓“外国专家”的作用, 是从旁协助推动工作, 并且把新的科技、观念、技巧介绍给中国同事, 而非做长期性的研究, 我已经恪尽义务。我们详细记录了熊猫在不同季节所食用的植物部位, 在实验室分析竹子的营养成分, 而且得知很多有关熊猫适应竹子生态的复杂细节。我们用无线电遥感勘测法, 监视熊猫的动作与日常生活周期, 这套方法是给熊猫戴一个内有无无线电发射器的颈圈, 个别监听它们的讯号。我们也厘清了保育熊猫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缓和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的步骤。获得基本资料以后, 待办的工作就很清楚, 其他人会填补必要的细节, 执行我们所建议的保护熊猫的策略。我必须承认, 一旦完成基本观察, 我的研究热忱就退烧了。我的心思转移到对我而言更迫切的新目标上, 也就是研究西藏高原上举世独一无二的野生生物。

熊猫计划仍在继续, 以中国人为主, 偶尔有外国人来插手, 我跟这些中国人没有来往, 但我读过他们的报告, 看过新闻报道, 也从我的同事那里听到一些消息。我故意不回到我曾投注大量心力的地方。这不难做到, 离开熊猫以后, 我仍在中国境内, 忙于研究西藏羚羊、野生牦牛、雪豹及其他面临生存威胁的高山动物。为了将我的经验和熊猫与人类相互接触的过程加以整合, 我觉得有疏离熊猫的必要。身为外国人, 而且是唯一的外国人, 连续好几个月都只跟中国人接触, 我觉得要在计划上达到真正的突破非常困难。我很自然对中国和熊猫都抱着两种看法: 一种是我本来的观念; 一种

是我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我的观察不见得一直都可靠；我知道它的有限，我尽可能随时调整，真相有时会随我的心情一起改变。我希望本书对中国人和熊猫的了解都是基于相互的体谅，这绝非易事，因为中国人和熊猫表面上都是那么清心寡欲而又平易近人，使人易生误会。

抹不掉的历史伤痕

熊猫计划是我所有研究中最困难的一项，不仅因为研究本身是观念简单但执行困难，更因为它有两个赞助单位：一个是从北京以至我们的营区，层层叠叠的政府机构；另一个是远在瑞士，跟熊猫隔着万水千山，却坚持要遥控所有状况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过去叫做 World 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现在更名为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这两个机构都对我们的工作缺乏完整的了解，彼此间又经常发生误会。

我长年在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坦桑尼亚、萨伊、巴西）研究野生动物，必须跟不同层次的政府官员打交道。生物学家不仅要研究自然，也要促成保育行动，这肯定会为计划惹来麻烦，因为行动一定会涉及政治层面，保育毋宁是社会问题，跟科技或科学的关系反而淡。有时是因为缺乏共同的目标与前瞻而产生问题，有时则因为沟通不良，我都已经习惯。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方面，在目的与方法上根本不能沟通的困境，却是我前所未遇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诚挚却又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人际关系，在处理最简单的任务，或甚至略微偏离严格规定的路线

时，都遭到重重障碍。我所有的行动受到巨细靡遗的监视和呈报，只要我在场，就会引起戒慎恐惧。

当然，一部分问题是因为中共一九六六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中国社会从自我批评到自我毁灭，处于非人所能忍受的压力下，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文革打压所有外国东西，跟国外的关系一律被视为反革命，会遭到迫害或下狱。一九七八年开始实施“开放”政策，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一九八〇年我抵达时的中国，跟一九九一年这本书的纪录告一段落时的中国，大不相同。最重要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一股新希望。但五千年文明塑造的中国人特性，里里外外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尊敬权威、慎终追远、人际关系（尤其跟外国人相处）上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不过，自从老百姓获得新自由，“多年来左派思想加诸的心理镣铐”渐渐解除，他们迫切的渴望更有实现的可能，我接触到的中国人不再步步为营，对我这个硬塞到他们中间的外国人，也格外的和善。

不为中国辩护

熊猫计划紧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阶段之后开始。我觉得这期间能身在中国是一种荣幸——这是这个国家本世纪唯一太平的十年。它给我一个机会，深入半世纪不曾见过外国人足迹的偏远山区，研究一种国宝级动物。我逐渐能欣赏同事的幽默、圆滑，以及对艰苦环境的任劳任怨。我学着去了解他们，对于那些西方人认为是冷漠、傲慢、阴险、崇尚特权的心态，虽然还未必能消极的接受，但也还可

以同情。记忆为我过滤掉计划的黑暗面，以及某些令我极为丧气的事。人的记忆在怀旧的情绪中，为何变得如此宽容而理想化？同时，独特的研究环境和迫切的保育问题，都是我喜欢在中国工作的原因，我在中国所花的时间，是我在任何其他国家从事野生动植物研究的三倍。

我并不想把自己说得太宽大为怀或富于同情心；我再怎么仰慕中国，也不至于为他们辩护。我的友谊不盲目，我对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佩服，也不足以使我对它处理整个计划的蛮横态度释怀。如果这本书只谈舍己为人、崇高的启示；只描写大自然的美与真，到最后又是一头熊猫得救，动机高尚的冒险，以大团圆告终，一定更容易写、也更令人愉快。本来我对熊猫计划的期望也是如此，可惜最后充满幻灭的现实不能尽如人意。

为了忠实呈现整个研究经过，我谈熊猫政治的篇幅不得不跟谈熊猫本身一样多。保育计划永远逃不掉政治与科学的分歧，所有谈这类计划的书都应该反映两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在挽救鲸鱼、犀牛及其他命运受公众关注的物种的奋斗纪录中，往往对保育的真正矛盾避而不谈，人类的贪婪与冷漠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熊猫已经成为一种高利润商品，就其本质而言，跟大象区别不大，因此也暴露出某些个人与组织不可告人的本质。确实，政治的阴影无论在科学或保育方面都对熊猫计划构成干扰，隐瞒这一点，对熊猫就极不公平。我知道任何纪录都难免失真，这使我不愿下笔。批评总令人不高兴、不接受，甚或造成误会。只以观光客身分或短期出差到过中国的读者，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可能跟我大不相同。只要在中国居住或工作超过一年的人，或许能认同熊猫计划

面临的困境。但不论读者的背景为何，我都希望能使大家更关心熊猫。

重新设计求生策略

濒临绝灭物种的书籍不断出版，我对于是否要在汗牛充栋的这一图书分类下再增加一本，更何况写的又是已有详尽文献的熊猫，感到非常迟疑。还有什么其他动物被人类抓到后，都要取个美美、丽丽之类的名字（叠字代表对它们的钟爱）呢？还有什么其他动物不论出生、患病、心不甘、情不愿的谈个恋爱、死亡，都要经报章媒体大肆宣扬呢？凡是想阅读熊猫资料的人，已经有很多文章和好几本书了。内容最丰富的两本畅销书是莫里斯夫妇（Ramona and Desmond Morris）所著，一九六六年出版的“人与熊猫”（*Men and Pandas*），这本书对于西方探险队杀戮和捕捉熊猫的部分尤其写得好。另一本是卡顿（Chris Catton）所著，一九九〇年出版的“熊猫”（*Pandas*）。此外，近年出了几本被捕获的熊猫，在自然背景下拍摄的写真集，都很受欢迎，这些书的文字内容有的拉杂琐碎〔普莱斯（Byron Preiss）和郭雪岳（译音）合编的“熊猫的秘密世界”（*The Secret World of Pandas*）〕，有的值得一读〔鲁慈（Clive Roots）的“竹熊”（*The Bamboo Bear*）〕。我和我的中国同事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卧龙大熊猫”，是一本科学论文，对本书只大略提及的细节有详尽的描述。

谈已绝种或濒临绝种动物的书这么多，似乎冲淡了绝种观念在大众心目中的严重性；一再重复会使重大事件也变得

平常。不管我们对灭绝其他物种的责难如何强烈，多数人似乎仍然把大自然置之度外。买这些书是否代表重视自然界？有关濒临绝灭物种的论文往往沦为回忆，所记载的物种真的已从世界舞台谢幕：度度鸟（the dodo）、旅鸽（passenger pigeon）、大海雀（great auk）、史德拉海牛（Steller's sea cow）等。至少我自己是不忍见濒临绝种动物的名单一再扩大的；我关心的能力有限。

但这些书有它们的价值。一再重述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忘怀是一种超乎我们所能负担的奢侈；忽略可视为一种虐待。有人以为，只要能把目前数百万种动植物的物种多样化状态保持到下个世纪，破坏就会终止——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件事。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经验做成纪录，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唤醒全人类的慈悲心，带动保育物种的行动。即使在一个绝对道德的世界里，破坏也不会终止，但至少人类精神经过一番洗心革面，我们可以用更高尚的情操看待自然。我们可以调整价值观和优先考虑，建立一套谴责制造废料，制止无必要破坏的大地伦理。靠激情和雄辩都无法造成这样的改变，定要先更新对自我的观念，重新设计人类的求生策略才行。

现代的神话奇兽

或许在某些方面，熊猫能改变我们的观念。它表面上的单纯让我们观察到它吸引人的特质。熊猫逃脱出它高山上的家园，成为世界公民，它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付出努力的象征。它虽然体格肥胖，行动迟缓，却独具创作的天分、艺术

的完美，仿佛专门为了这项崇高的目标而进化成这种模样。圆圆的扁脸、描黑圈的大眼睛、圆滚滚逗人想抱的体形，赋予熊猫一种天真、孩子气的特质，赢得所有人的怜爱，想要抱它、保护他，而且它又很罕见。再加上生者往往比死者更能打动心弦。这些特质，造成一个集传奇与现实于一身的物种，使它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神话奇兽。

我们能跟熊猫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进化历程发生交错，是我们的运气。我认为，万物皆值得我们欣赏与尊重，我们不能硬把不知价值为何物的动物定一个价格。但失去熊猫的损失，似乎还是超过失去樱草花或食人鱼，因为它是坚忍不拔、反抗命运的象征，能激起我们怜悯或佩服的共鸣。如果失去熊猫，我们就再也看不见它黑白相间的面孔，它的演化宣告中断，它独特的基因密码毁灭；它的名字很快就跟博物馆里尘封的档案中其他数千种绝灭物种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只留下一个诘屈聱牙的学名 *Ailuropoda melanoleuca*（意为“黑白相间的熊猫脚”）。再经过几个世纪的疏离，我们就只剩几件纪念品、几根大骨头、几块褪色的毛皮。熊猫的生命完全被遗忘，跟恐鸟（*moa*）或长毛象一般，被剔除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之外。对如此不寻常的动物而言，这是多么可悲啊！当然，生命都是倏忽无常，兴旺不久就会消失。但数百万年前，人类的进化尚未完成时，熊猫就生存在地球上，它们是生存竞争中的成功者，比起很多其他在冰河时代大变动中消失的大型哺乳类都生存得久。它们灭亡的时间应该还没有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熊猫漫长的演化史上极为重要，也是纪录最详尽的时期。这期间的事件若不逐一记录，难免会

被遗忘。我以科学使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去了解和记录，为一种不能言语的生命作翻译，把熊猫的生存状况留诸后人。这本书就是那笔遗产的一小部分。

铭感在心

各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奉献与合作，使熊猫计划得以实现。大部分帮过忙的人或机构，书中都有提及，我要在此对他们全体表达感激。我还要特别感谢若干人或机构所提供持续而无私的重大贡献。

我要感谢世界自然基金会邀请我研究熊猫，并把这个杰出的计划交给我负责。哈尔（*Mark Halle*）与艾列特（*Christopher Elliott*）辅导这项计划，并提供很多协助。

纽约动物学会慷慨的准许我怠忽国际野生生物保育科主任的职责，让我把全副精神投注在熊猫的身上。虽然这项计划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协议、正式资助的，但纽约动物学会也提供了大量财务上的协助。它负担我大部分的开销、田野调查的设备与补给、实验室分析等，它提供若干职员的劳务，并给予芮德一年的薪俸，总金额接近五十万美元。对这份金钱和道德上的支持，我特别要感谢纽约动物学会的会长康威（*William Conway*），他也到过中国协助设计卧龙养殖站。两位为学会工作的兽医，杜伦赛克（*Emil Dolensek*，已去世）和史托薇（*Janet Stover*），都曾放下他们繁忙的业务，分别来过两趟，帮忙养殖工作和照顾捕获的熊猫，我非常感激。

田纳西大学森林、野生动植物及渔业系的贝尔登

(*Michael Pelton*) 不仅提供他系里的电脑和图书馆设施，还派给我们的计划三位助理。奎格利 (*Howard Quigley*) 跟我一起把第一套无线电颈圈戴到熊猫身上，卡尔 (*Patrick Carr*) 负责用电脑分析电讯资料，江森后来成为熊猫计划的主要研究员，在书中都有提到。

目前任教于宾州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的泰勒、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芮德、田纳西大学的江森，执行熊猫计划都表现出高明的技巧与奉献热情。我离开这计划以后，他们都不断提供我有关系卧龙和唐家河的熊猫与人的消息，这份情谊我深为感激。

原本在康乃尔大学，现在任职于纽约动物学会的狄兰菲 (*Ellen Dierenfeld*)，最初在一九八〇年跟我联络，说明她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对熊猫营养所做的研究，并志愿协助我们的计划，尤其是在竹子的化学分析方面。她与罗柏森 (*James Robertson*) 后来在康乃尔大学动物系的实验室里，分析了数百个竹子的样本。他们的贡献对于了解熊猫的生活方式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狄兰菲也很有耐心地给我上了一课动物营养学，我对这方面所知甚少，说来惭愧。她的洞察有助于说明熊猫的活力来源。我从她那里获益良多。

驻香港的美国记者纳喜 (*Nancy Nash*) 是熊猫计划得以成立的主要推动者，多年来，她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帮助。她不断以她对中国人的敏锐判断，提供我们极有价值的忠告，接待与这个计划有关、路经香港的中外人士，寄送亟需的设备，并担任卧龙研究人员与北京之间的桥梁，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她很多友谊的表现，例如寄杂志和美食到我们孤寂的营地，总令我们感激万分。她推动熊猫保育不遗余

力，在中国人间赢得一个“熊猫妈妈”的封号。

我从一九八〇年开始，跟在林业部服务的王梦虎有联络。他在做熊猫计划和我后来几个计划的协调工作时，总是对保育工作十分投入。问题不论大小，到他手上，他总会尽力使外国人和各个中国人派系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和平衡。我很佩服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和技巧，他真正代表中国人所谓的“老朋友”。

四川南充师范学院的生物系教授胡锦涛是主要跟我地位对等的中国人，我回顾我们密切的合作过程，感觉很愉快。胡锦涛是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教我很多有关鸟类及其他森林生物的知识。跟他做田野工作是一件乐事，因为不论天气多么恶劣，地形多么崎岖，他都乐在其中。他永远怀着冒险的心情，对自然界充满好奇。

熊猫计划用过几位翻译员，邱明江是其中之一。他非常聪明，能说流利的英语，总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永不磨灭的热情、活力、理想主义。他热心学习，后来已不仅是翻译而已，他参与田野工作，并把两本有关熊猫的书从英文译为中文，他对研究和保育伦理极为投入，除了不眠不休的为我们的计划工作，还回大学进修生物方面的知识。

还有其他应该特别提出来致谢的人：奥尔（*Iain Orr*）寄了一连串的论文来，让我知道中国环保现况。容思和卢容飞为这计划作翻译，提供很多有用的建议。柯里格（*Douglas Kreeger*）捐赠冬天的靴子、睡袋及其他设备。沙德斯姊妹（*Lynn and Irene Saunders*），以及奥地利大使沃特（*Wolfgang Wolte*）夫妇在他们北京的寓所给我的亲切款待。布鲁宁（*Donald Bruning*）和劳瑞（*Andrew Laurie*）提供很多有关